

中华文化·教育丛书

罗素哲学译述集

张申府 著译

74388

DF83/06

罗素哲学译述集

张申府著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中华文化·教育丛书】

- 著 译：张申府
- 责任编辑：苏 蓓
- 封面设计：张玉梅
- 版式设计：黄 星
- 出 版：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印 刷：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LUOSU ZHIXUE YISHU JI

罗素哲学译述集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00,000

1989 年 6 月 第 1 版

198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530 册

ISBN 7-5041-0145-1

G·123/定价：（半精）3.30 元 （精装）5.30 元

序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是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逻辑学家、著作家。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罗素是英国新实在论学派的主要代表,后来又成为二十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罗素反对宗教、批判神秘主义,强调应该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大力提倡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分析方法,即根据感官经验,对于概念命题进行缜密的分析,从而达到比较明确的结论。罗素的哲学著作很多,最主要的是:《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1912);《我们的外界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1914);《心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 1921);《物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 1927);《哲学大纲》(An Outline of Philosophy, 1928);《意义与真理的探讨》(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1940);《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Human Knowledge——its Scope and Limits, 1948)。此外还有《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等哲学史著作。

罗素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早年著有《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

mathematics, 1903), 认为数学可以从极少数逻辑原则推演出来。后来又和另一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 (A.N. Whitehead) 合著三大本的《数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13), 对于当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罗素对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也都有较深的研究。他所撰写的关于道德、文化、教育、政治以及和平主义的著作, 对于西方国家中的进步人士起了激励的作用。罗素的文章著作分析细密、论证明晰、文笔优美, 引人入胜。因此, 1950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罗素晚年积极反对制造核武器, 攻击美国的越南政策。六十年代后期, 和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等人组织了国际战争罪犯审判法庭, 在国际上也有巨大的影响。

罗素的活动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是一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我们研究当代西方哲学, 首先要研究罗素的哲学。

罗素继承了洛克、休谟的传统, 力图考察人类认识的范围和界限、人类认识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和可疑性。关于心物问题, 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罗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事”(events), 所谓“事”既非心也非物, 而心与物都是“事”所构成的, 心与物是非心非物的要素的不同构造。他把这种观点称为“中点一元论”(Neutral monism)。这所谓中点一元论既有别于唯物论, 也有别于唯心论, 是一种折衷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哲学观点。罗素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他的《心之分析》总结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心理

学；他的《物之分析》则总结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物理学。这种重视对于科学知识进行分析总结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

罗素于五四时期曾到中国讲学。当时以介绍罗素哲学著称的就是吾兄申府。申府原名崧年，以字行。当时申府在《新青年》和别的杂志上撰文评述罗素的哲学思想，曾经有广泛的影响。

申府在评介罗素哲学的同时也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他曾经企图将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可惜只开了一个端绪，没有写出专著来。三十年代，申府关于罗素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评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郭湛波三十年代所著《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中曾设专章论述张申府的思想，足以考见当时申府在哲学界的影响。近年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在所著《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影响》（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中也着重论述了张申府的思想。（舒衡哲撰写《张申府传》已基本完成。）

五四运动以来以至四十年代，吾兄申府撰写评介罗素哲学的文章多篇。这些文章有评述，有译文。其中评述的文章简明扼要，译文则谨严准确。这些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评介西方哲学的重要文献。友人徐盈同志将这些文章搜集起来，按时间的先后编为一集，就是这本集子。1983年吾兄以九十高龄写了一篇《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作为此集的首篇。姪女燕妮参加了全部文稿的搜集校对工

作。申府曾拟将罗素《哲学大纲》译为中文，但是仅译出一部分，没有译完。因《哲学大纲》另有译本，这一部分译稿就不收入此集了。

为慎重起见，我请北京大学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陈启伟同志对于大部分译文进行审校，改正了原来发表时的一些错字，对于原来不够通俗之处略加修润。承教育科学出版社苏蓊同志、王树学同志的协助，使此书得以刊布。苏蓊同志细心审阅了全稿，并加了编者注。在此谨向陈启伟同志、苏蓊同志和王树学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书中的译文，有许多译名采取了一些早期的译法，如奈端，今译牛顿；代嘉德，今译笛卡尔；来本之，今译莱布尼茨等等。为了保留原貌，这些就不加改动了，希读者鉴之。

一九八七年一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代前言）

说到我对罗素的赞佩、敬仰，首先应提到我对罗素的发现，而这又必须先从北大图书馆对我的启蒙和帮助说起。

191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个时期北大的图书馆，只是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第二年，我考入北大本科，藏书楼也开始辟出阅览室来了，西文书摆在阅览桌四周的书架上，但平常总是锁着，中文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对于我，因为经常来这里，跟管理员十分熟悉，所以使我得就架恣意快读。那时书本来无多，除了工程书籍以外，几乎架上的书我都翻看过。一天，我发现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书，这是一个精装书，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为《我们的外界知识》，是英国罗素所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芝加哥一个德国人所办的公开法庭书店（出版公司）盛时，该店出版迦耳士所编的两个期刊《一元家》（Monist 季刊）与《公开法庭》（Open Court 月刊），这两个期刊经常登载罗素的文章，这都是我所最喜读的。

1910年,英国著名的《家庭自学大学丛书》(Th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计划出版一套丛书,由英国著名学者编写。罗素应约写了《哲学问题》一书,于1912年出版。这本书在当时深深吸引了我。《哲学问题》系统地论述了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基本方法。

在《哲学问题》一书中,罗素先生举例道,画家想要知道事物的外表,而实际的人则想要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哲学家比实际的人更强烈地想要知道它的本质。按照罗素的意见,研究哲学不是为了寻找那些问题的具体的、确定的、这样或那样的答案,如同物理学家所作的那样,而是只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扩大了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范围,丰富了我们智慧的想像力,并且减少了我们的“独断的自信”。据罗素说,这种自信,常常使我们的的心灵无法进行正确的推理。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哲学思维的对象——宇宙总体——是非常伟大,所以我们的的心灵也变得更加伟大。用我们一般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理,而这真理乃是伟大的、客观的绝对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哲学问题》以极其通俗的形式讲述了非常深刻的问题,所以,它既适合于一般读者,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我这个刚刚涉身哲学领域的年轻人,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的。

我广泛搜集罗素的文章、著作,并把它推荐给我的同学。1915年,芝加哥《公开法庭》(月刊)登载了罗素新著《战时的正义》的一则广告,我见后马上转告给同学好友。

与此同时,我开始醉心于罗素的研究,并翻译一些罗素的文章。1919年至1920年间,我先后翻译了罗素《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等文章,并写了几篇介绍罗素的文章,这些大都登载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

1920年10月,罗素偕同好友勃拉克女士来到中国,八日抵达上海。为了迎接罗素先生,我在九月中旬就离京到了上海。

罗素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校讲师,是一位著名的数理哲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大力宣扬和平,反对战争,论英国外交之谬,触政府之忌,受到禁锢,置囹圄半年之久。他在剑桥大学三一书院的数学原理讲席也被革掉。以后他漫游欧洲,考察战后各国社会情况,尤其是对俄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研究。罗素这次来华,是应梁启超所办“学术讲演会”(每年请一位国际名家)与北京大学联合之邀前来讲学的。

罗素到沪的第二天,在大东旅社举行了热烈的欢迎晚会,宴请罗素先生及勃拉克女士。这次欢宴是由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申报等六团体发起组织的,临时又增加了基督教救国会,约有一百人出席。席间,罗素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主要讲了来华的观感和印象,他希望中国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不要不分好坏而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在谈到中国的改造问题时,他认为各种改造之中最应注意以教育为第一。这是罗素来华后的第一次

演说,是由赵元任先生翻译的。

此后罗素又在上海的中国公学等地分别作了《教育之效用》、《改造社会的基本原理》等内容的讲演。他的演说,平易畅达,语皆中的。既富有充实的逻辑性,又幽默诙谐,饶有风趣。在分析问题时,罗素先生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尝无刺,但却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我曾这样说过,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结束了在上海的讲演,罗素先生由傅铜、赵元任等人陪同转往长沙讲演,我便回到了北京。

傅铜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在英国留学七年,但他曾讲从来没听说过罗素这个人。这次罗素讲学,他倒表现得十分积极。

从长沙,罗素一行又到了北京,这大概是1920年的11月了。罗素先住在大陆饭店,后又搬到东单北路东的一条胡同(胡同名称记不清了),住在一个四合院中。赵元任也陪同住在那里,我曾多次前往罗素住处去看望他。

罗素出身于英国世家贵族,并袭继了他祖父因功而封的伯爵爵位。但是我与他交谈起来,却毫无拘束之感。

我们的谈话是很随便的,我向他介绍北京大学,讲校长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特别是蔡元培先生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对此,罗素先生很感兴趣,他认为,今日遗传之旧教育,日见衰败,新教育自必起而代之。无论前人已发明多少事物,我人仍宜用科学方法自力

研究，以求最良之新教育。他说世界进步是无止境的，人类希望也是无穷的，新教育不但应用便利，而且其人生观也可较为高尚。罗素对中国在文化上的自由活动表示赞赏，他希望中国能创造一种极好的新文化，以补西洋文化之不足。

罗素的谈话坦率、透彻，并可以从中见其才思的敏捷，对此我是敬佩不已的。

罗素先生还向我谈起了他的俄国之行。来中国之前（1920年5月），他曾以非正式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工党代表团，考察俄国革命情况。在俄期间，罗素见到了高尔基、托洛茨基，并与列宁进行了会谈。他认为托洛茨基有点像拿破仑的形象，列宁待人很友善，没有一点傲慢的痕迹，这一点，托洛茨基是正好相反的。同时列宁又是一个很严峻的人，罗素对布尔什维克颇多贬辞，他说俄国之行使他的政治信仰受到影响。以前他是称赞俄国革命的，并曾写文表示支持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发表在纽约的《解放者》（Liberator）杂志上），但是考察俄国后，罗素一改过去的态度。他曾这样讲，他对苏联人民的贫困生活感到震惊，当时俄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危机，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使老百姓为了一点面包不得不排长队。由此罗素对诞生在饥饿与痛苦中的革命能否对人类智慧作出贡献发生了怀疑。

遗憾的是，罗素把战后苏联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完全归结于俄国共产党。他把俄共的宣传看成是宗教的鼓吹，故此他开始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并进而厌恶共产主

义。事实上,他把俄国革命完全理想化了,到苏联后,并没真正深入细致地进行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实际上是他的私人的感情与主观的立场、观点使他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现实。

罗素曾把他的访俄之行写成一本书,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此书概括了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看法。罗素的这种态度,遭到了许多人士的反对。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是我孤寂的结束,相反的,它是我更进一步孤立的前奏,过去同情我的和平主义者的人们,现在亦开始疏远我了,原因是我在访俄归来之后,写了一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不但不赞美他们所同情的苏俄的新的革命政府,反而对共产主义与苏俄国家大加抨击。”看来,罗素也不得不承认在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所感受到的孤立了。

在与罗素先生交谈的过程中,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来研究哲学问题。作为一个学生,我认真地听他讲述哲学观点,虚心求教并与之一起探讨,这是我们最有兴趣的。

这期间,我已办好了去法国的手续。为此当我见到梁启超先生时,他曾叹息道:唉,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梁启超时任财政部长,他发起讲学会,筹备资金,请来了罗素先生,这在前边已经谈到了。

我把即将赴法的消息告诉了罗素,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封信,把我引见给他的一个法国学生,嘱我到法后持这封信去找此人。可惜到法后,由于人地生疏,再加上

琐事缠身，始终没能见到。

罗素在北京时，还给我写过一封亲笔信，我始终保留着，直到今日。

1920年11月中，我准备离国赴法了。在离京的前一天，我去向罗素道别，在他的住处，我们谈了很久。罗素先生对我倍加鼓励，并愿意继续通信，一起研究哲学问题。最后罗素先生和赵元任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院门外。

从此之后，再也没能见到罗素先生，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通讯关系，主要是研究哲学和逻辑问题，偶尔他也送一两本书给我。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谈话中，总理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到中国来讲学了。

可是由于罗素年事已高，此次讲学，未能成行。

1970年，罗素先生逝世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走过了九十八年的历程，记得在庆祝罗素七十诞辰时，我曾祝愿他“由七十而八十，而九十，以至期颐地，更健在下去。”然而，他终于去了。

1973年，加拿大成立了一个“罗素研究会”，他们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将罗素给我的信件送给他们，但当时“四人帮”横行，政治形势动荡，更由于罗素的信件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终未舍得献出。

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小喜欢数学，以后又搞哲学、逻辑学，然而罗素的逻辑不是普通逻辑

或传统逻辑,而是一种新的逻辑,即数理逻辑。这门学问正式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罗素则是它的集大成者。他一生最喜欢说也最郑重说的话之一就是他坚信不用数理逻辑解决不了问题(特指哲学问题);他一生最大的著作,开辟新时代的旷世不刊之典《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是与阿尔费德·诺斯·怀德海博士(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写的见誉为崇阁的金字塔的天书;还有一部《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都是讲的这门数理逻辑或数理哲学。

一个大哲学家必然知识渊博;必然有所创辟;必然深切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有一个新的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生理想,这三个条件,可以说罗素无一不充分具备。综述罗素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对中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的哲学新潮流,是数理哲学的一代硕师。

为了表达对罗素的敬佩和敬仰,写就此文,聊作纪念吧。

1983年2月20日

125/06

目录

(iii) 序	张岱年
(vii)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代前言)	
(1) 我们所能做的(译文)(1919年4月)	
(15) 哲学之价值(译文)(1919年10月)	
(20) 罗素与人口问题(1920年3月1日)	
(31) 罗素(1920年10月1日)	
(38) 哲学里的科学法(译文)(1920年10月1日)	
(41) 梦与事实(译文)(1920年10月1日)	
(50) 民主与革命(译文)(1920年10月1日)	
(64) 罗素先生之哲学(译文)(1926年3月)	
(78) 自然与人(译文)(1926年6月)	
(85) 英国对华的蠢举(译文)(1927年4月10日)	
(88) 科学是迷信的么(译文)(1927年9月1日)	
(101) 意谓的意谓(译文)(1927年10月1日)	
(110) 幼儿的训育(译文)(1927年10月)	
(123) 什么是物质(译文)(1928年1月8日)	
(130) 自由人的崇拜(1928年1月15日)	

目录

- (133) 罗素论原子新说(1928年3月)
- (148) 相对论与哲学(译文)(1928年6月10日)
- (155) 新物理与光的波动说(译文)(1928年12月)
- (160) 行为主义与价值(译文)(1928年)
- (167) 罗素的演绎论(1930年9月)
- (177) 言语与意谓(译文)(1930年12月)
- (191) 关于罗素(1931年5月)
- (194) 罗素论西洋文明(1932年11月21日)
- (203) 论动转(译文)(1934年2月10日)
- (205) 概然与概率(译文)(1934年9月6日)
- (213) 有的人为什么让人喜欢(译文)(1934年10月18日)
- (215) 罗曼·罗兰与罗素(1936年10月31日)
- (219) 我们实在知道什么呢?(译文)(1936年11月21日)
- (222) 欧洲是一个成功者么?(译文)(1936年11月21日)
- (226) 祝罗素七十(1942年5月21日)
- (231) 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1942年5月21日)
- (235) 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1946年4月12日)